

# 论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目标与问题

桑移凡

厦门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福建厦门 361104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球各国、各个民族、各人的共同努力，全球华人也责无旁贷。当前，为实现有效“对话和沟通”，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听者”如何理解如何接受、“听”后如何“说”尤为重要；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定然是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相互理解”。确立目标、提出问题、确定研究方法框架是实证研究展开的必经之路。本文是“论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的上篇，主要理清该研究目标与问题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而在下篇中将针对上篇明确提出的研究问题给出解决方法，构建实证研究框架并讨论其可行性。本文通过梳理研究目标和思路流变，使研究目标和问题更加清晰，指出以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为主要媒介进行“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探索新加坡华族在传承传统文化时的独特话语体系，呈现其中的传统文化传承价值取向与话语策略，加深对新加坡华人的理解与认知，以此畅通“对话和沟通”的渠道。以全球华人的“共情”为阶段性目标，区域国别化的“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

**关键词：**新加坡；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华文教材；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区域国别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形象塑造和传播，尤其是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更有不少学者看到了国际中文教育这条能使传播更畅通、亲和而有效的道路，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国际中文教育最重要的载体——国际中文教材的中国形象“自塑”传播及策略研究。但相对来说，甚少有学者把目光放在“接受者”身上，即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听者”如何理解如何接受。胡范铸曾提出一个创新概念——“新言语行为”：“所谓言语行为，就是某言语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组织并发出一段话语，另外的言语主体接受到这一话语并作出有关联的响应的游戏。”胡范铸同时也提出了“主体间性”“案例”等概念，指出言语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我”和“你”，也包括“他”，将每个言语行为视为一个事件，一场“游戏”。“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该事件的“人际框架”应该同时包括“我”“你”“他”。中国作为“我”，不仅是行动的发出者和驱动者，承担着主动走向世界、分享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应该是行为的接受者，接受“你”“他”的反馈，而后者的的重要性往往会被忽略。如此一来，跟进“听”者即外国友人如何理解和接受、“听”后如何“说”的相关探索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同国家，乃至

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都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反馈，“区域国别学”也逐渐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探究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听众反应，不仅需要主动接触，还应是“建设性接触”，致力于使双方的话语体系吻合和融合，展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世界性分享，与世界各国“交换”故事，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形象的有效传播。对于与之“情感联系”越加密切、往来也越加频繁的新加坡，新加坡华人群体不仅与我们血脉相通，也是极其重要的桥梁；不仅是我们与新加坡对话沟通的桥梁，也是我们与世界对话沟通的桥梁。我们可以通过揭示新加坡华族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探索新加坡华族在传承传统文化时的独特话语体系，如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等，加深对新加坡华人的理解与认知，以此畅通“对话和沟通”的渠道。

本文就是基于上述理念和观点，同时梳理笔者在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过程的研究思路流变，使研究目标和问题更加清晰，指出以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为主要媒介进行“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探索新加坡华族在传承传统文化时的独特话语体系，呈现其中的传统文化传承价值取向与话语策略，加深对新加坡华人的理解与认知，以此畅通“对话和沟通”的渠道。

## 一、从新加坡说起：新加坡、华族、华文教材

新加坡是除中国外华人占比最多的国家，也是东南亚华人占比最多的国家，其国内华族华人占比高达 75.7%（新加坡统计局 2022 年数据）。从一个小渔岛发展到如今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发展之路令人惊叹也具有极高研究价值。与中国不同，新加坡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种族关系。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岛”，其国民大体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等四大群体组成。一个“弹丸小国”，不仅需要复杂国际关系中稳定生存，也要在国内平衡和维系各种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加坡华族是新加坡国内众多种族之一，在新加坡的治国理念里，华族与其他种族具有同等地位，并不因人口比例大而有任何优越。自新加坡建国之日起，新加坡官方淡化华族的国别色彩，认为对新加坡华人的定义必须超越国籍和种族，反复强调华族是华人先祖所创造的，是亚洲文明的一部分。<sup>[1]</sup>新加坡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都扎根于同一片土地，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新加坡华族的华语传承同其他种族的本族语传承一样，是传承本族历史文化、构建本族身份的一种途径，其开展华语教育的初衷和目的也是维系国族生存与发展，维护新加坡国家利益。新加坡华族在华语和华族文化传承的同时强调：新加坡华语文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必须是“新加坡的”，而不是中国的。新加坡华人认同的对象，是中华文化传统，而不是现当代的中国。<sup>[2]</sup>

如此，华文教材成为新加坡华族保留本族语言、传承本族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成为新加坡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输入和输出的重要阵地。新加坡华文教材主要由新加坡本土教师编写，主要受众是新加坡华族中小学学生。1980 年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了《小学普通课程华文课程纲要》（一年级），同时指示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着手编写统一的华文教材。从此，新加坡进入了由国家统一规划、编写华文教材的新时期。<sup>[3]</sup>新加坡出版的这些“全国官方统编华文教材”，对新加坡华族自成体系的传统文化研究具有极高研究价值。1990 年中新建立起友好外交关系，此后在新加坡，华语地位不断提高，华语教育越加受到重视，华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也趋于体系化与规范化。笔者发现，新加坡华文教材中占据最主要地位的文化，分别是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和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在传承传统文化时有时也会提及中国。但纵观 1990 年来的所有新加坡华文教材，近现代中国的直接刻画和描写

几乎没有。

## 二、研究目标的确立与思路流变

### 1. 不破不立：“传统文化传承路径”探索的批评与转向

事实上，笔者最先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形象，先验地认为新加坡华文教材既然是新加坡本土编写的学习中文的教材就会含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形象塑造，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中心主义”而不自知。如前所述，实际教材中很少提到中国，但却有大量篇幅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叙述。那这些中华传统文化到底是不是“中国形象塑造”呢？或说其叙述目的到底是不是塑造中国形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若是充分了解新加坡国情和华文教育实情，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及其教材的编写使用，都是围绕一个中心目的：传承和保留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维系国族生存与发展，维护新加坡国家利益。“新加坡华人认同的对象，是中华文化传统，而不是现当代的中国。”因此教材中回避中国、淡化中国的现象是可以预见的，其中叙述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不应该再将其视为“中国形象塑造”来进行研究，或许称之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更为合适。

根据“新言语行为”理论，<sup>[4]</sup>每一个言语行为都是一个事件，而该事件或言语行为中最为核心的应该就是“意图”。若将每一套的新加坡华文教材编写团队视为行为主体，那么“编写一套能够成为新加坡华族保留本族语言、传承本族文化重要媒介的华文教材”就是一个事件，该事件的核心是“保留本族语言、传承本族文化”这个意图。围绕着这个核心意图，进而明确研究目的，即这个意图是如何实现的，也即新加坡华族的“传承路径”，既包括“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传承”，也包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于是我们聚焦于“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与话语策略，探索与之同宗同源的新加坡华人如何阐释和传承我们华夏民族共同的传统文化，总结出新加坡华文教材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观是话语体系和文化核心成分，是影响甚至决定我们“对话和沟通”是否有效的关键；也因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应是去“发现未知”而非“印证已知”；更因这是当前全球华人“民心相通”和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迫切需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颇为重要的一环。

### 2. 思想革新：“对话和沟通”“华夏民族传统文化”

研究最初，笔者不仅曾试图将新加坡华文教材中的华夏传统文化视为“中国形象塑造”进行分析，也曾将其定义

为“他塑”。这实际上是将新加坡视为为了“他者”。而“他者”这一译自西方殖民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对抗”性的，而非“对话”性。若是带着这样的非交流姿态去研究教材中的传统文化，也很容易陷入“中心主义”，自然而然地将这些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并作为“中国形象塑造”来分析。

张虹倩、胡范铸<sup>[5]</sup>曾称，孔子学院开办与发展的国外阻碍有二，一是源于所在国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二是来自异质文化的困扰。那对于当代新加坡这种非“意识形态封闭”也非“华夏民族文化为异质文化”的国家，面向新加坡的“中国文化传播”，即使不会被视为“文化侵略”，是否会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包围”？那其为何自卫甚至回避中国，以至于会出现文化同源却不如想象中亲近的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中方编制的一带一路系列节目新加坡篇《远方的家》第 40 集中，中国主持人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见到古代货币上的“字”，博物馆介绍人员（新加坡华人）介绍到这些是“华文字母”，主持人紧跟其后恍然大悟脱口而出“为什么在这个上面会出现中文字呢”，该新加坡华人的回应中仍然充满“华人”“华文字”。若我们不改善文化传播模式，就很难解决这样“自言自语”的问题。任何有效的言语或言语行为都是基于“对话”，基于“相互理解”。而要想改善现在的对新文化传播模式，首先就要理解对方。最早由哲学家康德提出，又被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皮亚杰引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图式”概念也已告诉我们，人的认知发展总是在自己的“认知图式”内进行，是一个不断丰富原有图式的过程。在人的原有图式内进行新知识、新概念的学习是最有效的，同样的，在其原有图式内接收新文化和与之对话也是最有效的。

我们不仅要主动了解和理解新加坡，更要在一个平等对话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显然，在平等对话关系的基础上，就不能再将传统文化称为“中华文化”，不能再将新加坡视为“他者”。承认新加坡的国家属性，承认其华族是与我们共承“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加坡国族，不管在研究视角和思路当中还是在国家、机构和双方民间的有效对话中，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 三、确定研究材料与提出问题

#### 1. 华文教材研究媒介何以可能？

要想较为直观、系统、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华族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新加坡华文教材无疑是一个合适的研究材

料和媒介。笔者阅览了 1990 年来由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统一指导编写的四套小学华文教材（1994 版《好儿童华文》、2002 版《小学华文》、2007 版《小学华文》、2015 版《欢乐伙伴》）及部分中学教材，其中呈现了大量的叙写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相关文本。尽管 2015 年新加坡为了庆祝建国 50 周年曾出版第一部华人通史《新加坡华人通史》，但新加坡的这些“全国官方统编华文教材”具有高时效性，每套教材各学段年级并不是一次性出版，而是几乎每年编写出版一个年级的对应教材。如最新出版的《欢乐伙伴》这套教材在 2015 年出版了一年级上、下册，2016 年出版了二年级上、下册，2017、2018、2019、2020 年分别出版了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上、下册。相比《新加坡华人通史》的“一过性”成作，自华文教育正式开展以来连年编写和更迭的新加坡华文教材显然是更具时效性、连续性和系统性，不仅能更为直观、系统、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华族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也能够通过一个较为完整的历时态研究呈现其演变规律并预测趋势。

新加坡华文教材不仅是“中国故事”的“听者”，也是面向其国内华人群体的“自己的故事”（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说者”，而后者也是其编写使用的核心意图。从新加坡华文教材“说什么”“如何说”揭示和解读新加坡华族历年来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呈现其传统文化传承价值取向与话语策略，了解其对“中国故事”如何反应，对“自己的故事”如何叙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理解新加坡华人的想法，倾听新加坡的“声音”，掌握新加坡的社会话语体系；可以从新加坡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思考当前如何有效开展面向新加坡社会的中国故事“分享”和“交流”，与之“共情”，从而对双方对话可能产生的话语效果进行预判，保持足够的敏锐度。

#### 2. 提出问题

做实证研究之前，先要明确的是研究目的、研究材料，进而提出问题。上文已经讨论了该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材料，这里要讨论的就是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提出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界定本研究中的“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笔者在充分阅读 1990 年来的四套小学华文教材后，发现教材中有相当比例通过直接呈现华夏历史名人故事、华夏民间故事、华夏寓言故事或选取华夏经典文学作品等方式

或途径传递某些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课文；同时也有相近甚至更大比例的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即那些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融入了新加坡本土元素的文化内容。显然，前者的直接意图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后者的直接意图是“新加坡华族在国家中的身份构建”。

2022 年<sup>[6]</sup>李丹在其《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欢乐伙伴〉文化因素研究》中对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欢乐伙伴》中的文化因素呈现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尝试将教材中的“华人文化”分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新加坡的 2002 年《小学华文课程标准》<sup>[7]</sup>中将“思想性与文化性目标”分为两大项：“传统文化”和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有专门的“传统文化内涵”板块明确提到“选用一定数量的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篇章，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文化”，这些内容包括“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的节日与风俗习惯”“重要的历史故事与人物”“著名的作家与文学故事”“著名的历史与文化古迹”“古代重要的发明”；而新加坡的本土华人文化被融于“核心价值观”中。该课标中也对篇章类别做了明确规定，将篇章划分为“特定篇章”和“一般篇章”，其中“特定篇章”是那些“富于传统文化内涵，以传授传统文化为主目标的篇章”，而“一般篇章”为“富于生活气息，以教学生活语言为主目标的篇章”。我们在“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中所关注的，就是那些直接呈现华夏传统文化的篇章，是那些传统的、原始的、未有新加坡本土华人标记的华夏民族文化，我们共承的“传统文化”。这里的“传统文化”是狭义的，如 1994 版《好儿童华文》中直接叙述岳飞爱国故事的《尽忠报国》、关于“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谁是百兽之王》等。

以“价值观”为核心，围绕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笔者将研究目标和意义转向实现中国与新加坡的情感沟通，更深刻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的对话交流，对新加坡华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1) 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直接意图下教材中主要呈现了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是用哪些形式呈现的，具有什么样的形式价值取向；这些传统文化主要传递了哪些价值观，具有什么样的主题价值取向，历年来的变化或演变趋势如何？

(2) 教材中呈现的这些传统文化，使用了什么样的话

语策略，历年来的变化或演变趋势如何？

(3) 经前两个问题回答而出的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对中国如何与新加坡平等对话有什么样的启示？

(4) 新加坡华文教材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又对目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承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问题 1 和问题 2 试图揭示教材中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包括形式价值取向、主题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其中问题 1 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挖掘新加坡的华文教材倾向于通过哪些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例如通过讲述华夏历史名人故事、民间故事、神话故事或流传某些华夏经典文学作品等等；挖掘新加坡的华文教材在实现传统文化传承时倾向于传递哪些价值观，什么层次（个人、社会、国家等）的价值观。问题 2 同样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出发，揭示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为实现其国族内的有效传统文化传承，在课文文本中使用了哪些具有强立场性和目的性的话语策略，例如对文化根源国（中国）的话语策略、文化历史性话语策略、文化民族性话语策略、文化东方性话语策略等。

问题 3 和问题 4 是以解答前两个问题为基础，展开实际运用，希冀该研究结果对现阶段的中新外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尤其是启发“国际中文教育”这条现实路径在其中该如何发挥作用。

#### 四、结束语

任何研究都是目标、问题和方法的统一体，是一个有时间性并层次性递进的过程。本文是“论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的上篇，主要理清该研究目标与问题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而在下篇中将针对上篇明确提出的研究问题给出解决方法，构建实证研究框架并讨论其可行性。在实证研究展开之前，确定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尤为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头绪，使我们从始至终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使研究的每一步都有据可依；经本文对研究目标与问题的清晰讨论，进而将指引我们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

我们须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球各国、各个民族、各人的共同努力，全球华人也责无旁贷。同宗同源的华族人分散世界各地，是沟通世界的重要桥梁，全球华人的“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将成为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开端，与在外华人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也

理应成为当下重要任务。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定然是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相互理解”。我们不仅要为“讲好中国故事”创造良好话语环境，也要“倾听”世界的声音，“倾听”世界华人的声音，在互相理解之后与之产生“共情”。以全球华人的“共情”为阶段性目标，迈出“主动理解他人”的一步，区域国别化的“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将致力于让同宗同源的全球华人理所应当形成“情感共同体”，畅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路。

#### 参考文献

- [1] LOW Sze Wee: DIVERSITY AND SINGAPOR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ngapore City Book Room.2020page3-5.
- [2] 陈照明：《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文的现状与未来》，[M]. 新加坡：联邦出版社，2000:4-5.
- [3] 罗庆铭、王燕燕：《新加坡华文教材研究新视角》，[J]. 新加坡：新跃中华学术中心，2012:1-25.
- [4] 胡范铸、陈佳璇、甘莅豪、周萍：《“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兼论构建“机构形象修辞学”和“实验修辞学”的可能》[J], 当代修辞学 ..2013.4:1-9.
- [5] 张虹倩、胡范铸：《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J]. 社会科学，2017.10:26-35.
- [6] 李丹：《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欢乐伙伴〉文化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022:15-20.
- [7] 新加坡教育部：《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02:1-55.